

[经济学论丛]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 产业升级研究

Economics
Monographs

THE RESEARCH ON BEIJING
INDUSTRY'S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张辉 等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基地) 05BJDJG154

[经济学论丛]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 产业升级研究

Economics
Monographs

THE RESEARCH ON BEIJING
INDUSTRY'S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张辉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成果(基地)05BJDJG1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张辉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6

(经济学论丛)

ISBN 978 - 7 - 301 - 12475 - 8

I. 全… II. 张… III. 产业结构 - 研究 - 北京市 IV. F1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3107 号

书 名: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

著作责任者: 张 辉 等著

责任编辑: 张慧卉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2475 - 8/F · 166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348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

本书是以刘伟教授为负责人所承担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地)“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课题号为05BJDJG154)的最终研究成果。全书由刘伟教授负责总体结构并协调各章节分工协作,唯国余、黄桂田、李绍荣、盖文启、徐念沙、张辉、朱华晟和郭胜等参与研究了不同阶段的讨论。此外,刘涛和赵龙节两位博士研究生,宋加平、陈倩倩和任宝三位硕士参与了书中案例部分的调研和写作。具体分工为张辉统稿和撰写第一章至第五章以及第十二章;宋加平、张辉、赵龙节、朱华晟和刘涛撰写第六章和第七章;刘涛、宋加平和张辉撰写第八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陈倩倩和张辉撰写第九章。感谢王跃生、何晓峰和刘文忻等教授在课题开题讨论中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随着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跨界外包和海外直接投资等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研究全球经济的思路不得不作相应的改变,因为仅仅从宏观上用贸易和投资数据已经不能清晰地解释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机理。宏观统计数据只能使我们对全球经济的地区分布有个粗略认识,却几乎不能发现全球产业链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真实形态和内部结构。而对于地方产业升级的问题,又不能仅仅从地方产业内部、企业的本土战略和地区经济等微观层面来研究,而需要透过地方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从企业层面上看,企业的出口增加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在本地的设计、生产和营销方面的努力,而取决于其参与国际性的设计、生产和营销网络的程度。这样就需要从一个中观的角度来研究。而从全球价值链下各个地方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经济全球化,既能保证全球或跨界的视角,又能把特定的地方制度、环境等因素考虑进来。

在全球经济的这一深刻变化中,全球分包网络的形成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造就了世界经济一系列新的经济结构,格雷菲(Gereffi)等人称之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并用全球价值链

的理念来研究这种新的全球经济现象。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诸多学科交叉发展的基础上,全球价值链已经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在 21 世纪初粗具雏形。全球价值链及其相关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转移为研究基础。由此展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新的分工体系中是如何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虽然,该类研究与我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但是无论是全球价值链理论还是其早期研究商品链和全球商品链,在国内的研究文献都十分罕见。我国只有在全球外包网络和海外直接投资这两种全球价值链片断化的具体表现方面的研究。直到 2004 年,该类研究才在国内悄然兴起。

全球价值链主要从经济全球化下产业的组织层面(产业链条的全球组织)、空间层面(全球与地方)、产品和服务层面(链条各个环节如何切分)等角度来研究产业转移和海外直接投资等全球化下的经济现象。它从全球的视角来研究产业链条的空间配置,而产业链条各个环节在空间上的分布又具有很强的地理集聚性,从而大多以地方产业集群的形式出现。由于全球产业链条片断化后,一般会在世界各地形成众多占据某一价值环节的地方产业集群,因此在全球化研究文献中,总是能看到诸多学者把全球价值链与地方产业集群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地方产业集群的研究会涉及环境、人口、政府和文化等因素,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价值链分析中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变得充实起来。

本书不但可以提高对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理论认识,而且对认识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对北京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意义。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以经济全球化为研究背景,融合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来重新全面审视全球化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兴的理论。其对认识国际贸易以外的国际投资特别是国际产业转移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对于快速发展中的北京市来说,全球生产系统究竟如何影响北京的企业和地方经济,如何通过相应的地方战略来帮助北京市各类产业在全球技术阶梯上攀升,这些问题在全球价值链及其与北京相关产业的关系研究中能找到一定的解释和答案。本书也是将全球价值链理论系统地引入地方经济中的一次有益尝试,特别是为转型时期的北京产业升级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建议。

本书结合北京信息与电子、生物工程与医药、光机电、创意和汽车等产业,从全球价值链下空间等级体系、动力机制、治理、经济外部性和产业发

展空间载体(工业园或产业集群)等由外到内地构建全球价值链下北京地方产业升级研究的基本框架,在理论、一般案例和重点案例的互动分析中总结出研究的结论和启示。

在全球价值链空间等级体系中每一等级的价值环节都有自己对应的研发等生产服务活动,由此表明从简单经营活动的转换判断产业升级是有问题的,产业升级与否核心在于其处于全球产业价值等级体系的位次有没有实质性的提升。在同一层次价值环节从生产活动到服务活动之间的转换很可能是地方产业陷入了升级陷阱之中。例如,北京2000年以来电子信息产业人均产值徘徊不前,预示了北京该产业可能已经陷入升级陷阱之中。

从京津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经济景观的巨大差异可以发现,北京与周边地区过大的经济落差实际上已经严重约束了产业蔓延式布局,而随着京津地区不断推高的房价等成本因素又进一步恶化了大北京经济圈内发展水平的垂直落差,这样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由于没有形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那种大地域分工协作下共同富裕、联动发展的基本经济格局,所以未来北京产业整体升级能力和地区辐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书中通过对集群多种治理模式的全面论述,使读者能够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到产业升级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从而细致地解释了北京市产业如何创新的问题。例如,关于领导型治理模式的阐释基本就让我们从产业组织角度上看到,只有大企业,或者说是达到了竞争性市场所要求的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企业,才能够具有较有力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而围绕领导企业展开的中小企业则一般具有更为系统地将技术创新在产业组织上专业化的功能,也就是说,尽管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但围绕核心技术创新所实施的产业链及专业化配套,如果由大企业本身直接来完成,则可能不经济;而通过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体系,主要是中小企业加入产业分工链,则可能更有效益,同时也可能更为专业化。当前北京未能对周边形成有效的经济辐射,最外在的表现就在于北京未能形成空间相邻、大小合理搭配的产业分工体系或地方产业生态群落。

从全球价值链驱动力来看,那些属于购买者驱动是北京优势服务业能否完成产业升级,基本取决于北京能否形成一批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和代理商等。北京的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光机电等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重点就应该侧重加工制造能力的形成,除必要的配套合作外,通过

垂直一体化来追求规模经济所带来的竞争优势。

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正在发生急速变化,从以往产品和服务质量过渡到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等,目前对整个产业链条的治理能力越来越成为未来升级的核心所在。由此表明,北京未来能否占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就在于北京能否在国内以至全球获取地方优势产业的治理权。

从北京电子信息、光机电、生物医药和创意等案例研究来看,产业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产业链条的完整性。科研无法转化为生产力,或者产业区与知识区缺乏良性互动,很大程度在于北京缺乏相应的工艺技术水平。针对我国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北京,本书认为正常情况下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改善过程,那么只有适合本阶段或北京区情的创新才能推动北京产业升级。

总之,全球化将通过地方产业对北京地区发展及其空间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全球化与北京地区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本书不但对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地理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政府领导者、企业管理者和一切关心我国地方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有识之士都具有重要的阅读价值。限于研究者水平等原因,书中难免有不当和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书中案例部分由于调研所得,资料摘引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课题组

2007年4月10日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概述	/1
1 研究背景	/1
2 国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来龙去脉	/9
3 国内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综述	/16
第二章 全球价值链片断化与产业集群化	/24
1 价值链片断化与地理集聚的内外根源	/24
2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32
3 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基本模式	/47
4 小结	/58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	/59
1 生产者和购买者二元动力机制	/59
2 三元驱动模式	/63
3 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来制定北京企业和区域战略	/70
第四章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74
1 研究概述	/74
2 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治理模式	/77
3 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之间的治理关系	/87
4 全球价值链治理者	/90

5 小结	/93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升级轨迹	/94
1 研究概述	/94
2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	/97
3 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下的升级之路	/100
4 小结	/124
第六章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区与知识区互动模式	/127
1 知识区与产业区互动的意义及途径	/127
2 北京知识区与产业区之间的互动发展	/137
3 推动两区互动,促进北京地方产业升级	/146
第七章 工业园区——北京参与全球分工的有效载体	/157
1 北京市工业园区的分布	/157
2 北京依托开发区形成众多制造业优势产业集群	/164
3 工业园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167
4 案例——中关村科技园区	/172
第八章 混合模式驱动下的北京信息与电子产业	/184
1 电子信息产业概况	/184
2 北京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	/194
3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信息与电子制造业的升级	/204
第九章 链条转换——北京创意产业	/216
1 研究背景	/216

2 北京创意产业之一——画家村	/224
3 启示	/235
第十章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光机电产业	/238
1 光机电产业及其发展	/238
2 北京市光机电产业发展现状	/244
3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光机电产业升级研究	/248
第十一章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生物医药产业	/262
1 世界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的发展	/262
2 北京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272
3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升级研究	/281
第十二章 结论	/293
1 都市连绵区是价值环节蔓延式布局的空间表现	/293
2 工业园区是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有效载体	/294
3 全球价值链不同驱动机制下北京产业发展策略	/296
4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北京产业发展路径	/297
5 全球价值链空间等级体系与北京产业发展	/299
6 北京产业区与知识区联动发展	/300
7 链条转换北京产业跨越发展的机遇所在	/301
8 北京信息、汽车、光机电和医药等产业发展策略	/302
参考文献	/304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概述

1 研究背景

1.1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

全球化是一种现象,表示那些在地理上分散于全球的经济活动开始整合或一体化(Dicken,1998)。正确理解这种一体化的经济现象,需要对其产生的国际背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在经济上,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传统制造业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跨国投资为基础的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并随之深化了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同时,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作用增强,一定程度上为建立全球资本主义规则,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在政治上,‘冷战’结束为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扫除了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劳动地域分工成为可能。再次,在技术上,近二十年来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不但带来了新的企业组织方式,使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链前所未有地方便;而且也使世界各地的人及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即所谓的时空压缩”(刘卫东,2003)。

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经济还处于相对自给自足的时期,产业组织是以国内垂直一体化的企业为主。通用(GM)的前总裁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就曾经说过:“凡是对通用来讲是好的,对整个美国也会是好的。”这是当时大型企业集团垄断国内经济的典型写照。20世纪60—7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鞋、服装、玩具和低档电子产品等传统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并由此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了二十多年。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典型的就是这几十年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出口份额持续大量增加。全球制造业的深刻变化反映在全球生产方面,就是生产组织的片断化或分散化,各个价值片段会广泛地散布于全球不同的地理空间。同时,全球生产系统并没有因为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的垂直分离而变得越来越松散,相反,系统内各个价值环节之间的协作性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密。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在这一深刻变化中,扮演了主要驱动者的角色。

根据《1998世界投资报告》和《2003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1968—1969年全世界有跨国公司7276家,分支机构27300家,1980年增加到1.5万家,2000年底则增加到63834家,分支机构达86万家,员工近4600万人,遍布全球各地。1999—2002年四年间,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吸引外资都在2000亿美元左右,其中跨国公司就占据了85%左右的份额(何智蕴、周晓东等,2004)。从1980年到1998年短短19年,按制造业在总出口中的份额来衡量,新加坡从43%上升到了86%,泰国从25%上升到了74%,马来西亚从19%上升到了79%,印度尼西亚更是创造了从2%到45%的神话,中国也从48%上升到了87%;同时,即使东亚那些最早工业化的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这19年间该比例也基本没有跌破它们在80年代初就达到的90%的高比例水平,始终维持在90%—95%(Dicken,2003:48)。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其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到2001年,美国市场上,大约90%的电子产品,80%—85%的鞋、玩具、箱包、手表、挂钟、游戏和电视,70%的自行车,60%的计算机和57%的服装来自海外(USITC,2002)。其中,大多数产品又来自发展中国家,例如55%—60%的纺织品和内衣,50%的晶体管和半导体,36%的计算机进口于发展中国家(UNCTAD,2002:57)。从2001年以来,沃尔玛(Wal-Mart)在全球的销售总额也由1913亿美元上升到了3500亿美元。此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4年亚洲发展展望》,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铜、锡、锌、铂白金和钢铁的首位消耗国,铅和镁的第二大消耗国,镍的第三大消耗国,金的第四大消耗国;中国目前也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并且占据了2003年石油新增需求的35%;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盈余几乎与其对东亚和东南亚等国的贸易赤字正好吻合;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2003年新增出口中几乎有

80%来自中国;中国从东亚和东南亚进口的中间商品总金额已经超过了其2003年总进口额的一半,结果中国对非亚洲经济体的出口也陡转直上(ADB,2004)。2001年中国出口同比仅增长了7.5%,而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同比增长则分别达到了21.8%、37.1%和35.7%,三年间外贸总额翻了一番,2004年全年外贸总额达1.1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沈越,2005)。2006年中国全年进出口总额17607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3.8%,加快0.6个百分点;顺差额达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5亿美元。预计,2007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额将超过2000年全年的出口总量,进出口总额有可能超越美国和德国,位列世界第一。此外,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也已突破万亿大关,高达10663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473亿美元,大幅度超越日本的八千多亿,稳居世界第一。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但越来越紧密,而且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总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价值创造和分工体系在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一方面,发达国家对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作了一次重新定位,将重心由生产制造转移到了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服务和制造业中高附加值环节等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接受了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生产制造等价值环节,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此外,伴随着国际经济在全球空间上剧烈的重组和再构,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网络也成为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组织方式。

1.2 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地方发展的关系

虽然全球化概念仍不明晰并存在争论,但就经济全球化中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重组,还是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刘卫东,2003)。经济全球化虽然导致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不过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各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地理距离也越来越远,在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情况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能远隔数万里,对此就需要制定国际统一的商品标准来协调各自的关系(侯若石,2000)。此外,根据外资与地区制度环境相互作用的“被动嵌入”模式研究来看,全球化是依赖于地方制度环境的一个过程,离开地区谈全球化是一种理想主义;同时,地区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得益处取决于自身的知识创新与制度创新(刘卫东,200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地方发展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

重。一些地区越来越被边缘化,另外一些地区则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冲击。例如,1970年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有25个,而2003年则增加到了51个(赵景峰、沙汉英,2005)。

目前,中国经济也正在大规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全面地同全球产业高度融合(金碚,2003)。例如,虽然2006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达2000多亿美元,不过我国对美出口的约3000亿美元中,外资等非本土企业占据了2/3以上的份额。全球化已经使得全球分工体系全面超越了一切固有的地理边界。此外,全球化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以外资为代表的全球化力量对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外资的进入集中在我国少数沿海省份,参与经济全球化将强化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特别是东西差异(刘卫东、马丽、刘毅,2003);其次,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一国或地区的产业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林毅夫,刘明兴,2004),本地的优势又往往来源于本地合作紧密的地方产业集群(王缉慈等,2001);再次,20世纪80年代初依托地方关系发展起来的许多产业集聚区,当本地的生产网络和地方环境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时,这些企业就开始向区外,甚至国外发展,逐步把生产供应和销售网络向全球化方向发展(马丽、刘卫东等,2004);最后,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工业生产活动的跨地区转移变得越来越容易,而跨国资本一般对地方发展缺乏长期责任感,由此已经带来了众多经济全球化下的负面影响(王缉慈,2004b)。

关于外资在我国的空间分布以及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区域差异问题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重视。例如,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的研究表明外商的直接投资倾向于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他们认为工资水平可以解释为劳动力素质高、技能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也较高,这将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此后,贺灿飞和梁进社(2004)的研究则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化程度是造成省内地区差距显著不同的最关键因素;90年代末各省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转而成为导致省内地区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孟晓晨和石晓宇(2003)在对深圳的研究中也发现,在深圳“三资”企业集中的12个行业中,如果以深圳市中心,到城市边缘的最远距离定为100,作为横轴,以中心到边缘的企业分布为纵轴,采用空间洛伦兹曲线分析方法,结果显示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都按照距离衰减规律向心分布;而家具、服装等低技术行业则都按距离递增规律离心分布。这种研究基于对产品技术类

别的差异性,说明了参与全球化的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格局。

在外资对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作用越来越强的研究中,从全球价值链分析角度可以做出以下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我国沿海最早开放的地区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所承接的大多是纺织服装、陶瓷等传统产业,其在以产业附加值高低为划分依据的全球价值链条中处于最底端,而我国当时接受的国际上的这些产业转移又基本是这些全球最底端产业链条中的最低层次,由于等级很低,所带来的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也就不是十分明显;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吸收了许多全球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条,虽然在价值分工中仍然处于最底层,不过该类产业链条的引进本身就是一次链条转换型的大跨度的升级。这种链条的升级,会对劳动力素质、技能水平等有着与以往不同的要求,而且一般都会远高于以往的要求。例如,北京、苏州、深圳等国内发达地区近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基本就得益于这种链条升级,在这种链条升级过程中也为当地造就了大量的白领阶层,结果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开始加剧。未来北京的产业转型也基本会遵循该类竞争规则。这也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但全球产业链条内部各个层面上存在价值差异,而且产业链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价值差异。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避免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前提条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能否利用本地比较优势,又决定了地方未来发展的成败;全球分工体系在地方区位选择上是有一定内在规律可循的。

1.3 全球化下产业再配置的地理特征

传统的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是由国别经济汇总而成的,无论是斯密的绝对利益原则、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原则、俄林的价格差异还是巴朗斯基的地理分工,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虽然各自的观点上有一些差异,但都可以归结为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即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奠定了全球产业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王缉慈等,2001)。

在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条及其辅助体系等诸多方面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再配置等问题,许多研究者过去未曾思考过。迪肯认为,在考虑全球化进程的时候,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局面。此外,全球化过程也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范围的概

念都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是相互对应的(Dicken,1998)。图 1-1 就表明了这种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单个产业的生产链或商品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分布于不同地理单元中的垂直组织结构,与这一产业垂直分离组织结构相切的平面就是一个在空间上拓展开来的全球地理或区域地理空间(Dicken,1998)。从图 1-1 的垂直角度,可以看到全球产业链条发生了垂直分离,而从水平角度则可以看到全球不同的地理空间,将二者结合起来,就基本展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产业链条再配置的地理分布特征。这一再配置实际上是按照一定的等级关系配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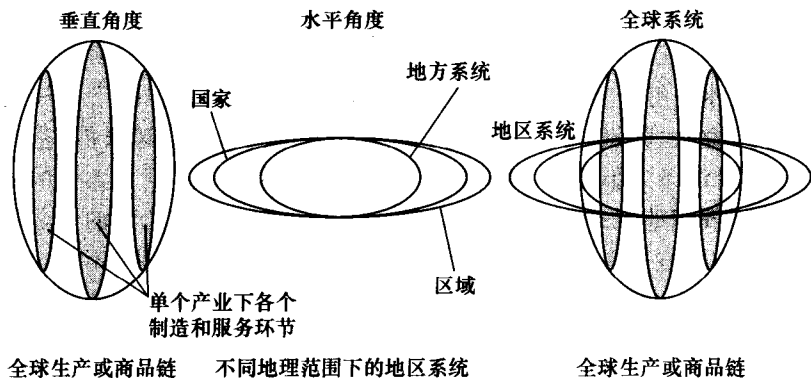


图 1-1 经济全球化下全球商品链各个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

资料来源: Dicken(1998:13)。

1.4 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经济中的价值

20 世纪 7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虽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但是地理区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但没有像有些学者预想的那样不断削弱(O'Brien,1992; Cairncross,1997; Gray,1998),反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区域无论对财富创造还是对世界贸易的重要性都日益凸显出来了(Storper,1997; Porter,1998a; Scott,1998)。一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各种经济要素在全球越来越自由地流动起来。例如,近十多年来科技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大量科技资源在全球快速流动着,分分合合,不断优化重组(江小涓,2004)。另一方面,大量高素质的专业化的技术和知识、组织机构、专业化的企业、相关的贸易,以及复杂的消费者或客户,往往又集中在特定的地理区域(Porter,1998b)。例如,在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充满活力的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

以传统产业集聚而形成的“第三意大利”(The Third Italy)^①的新产业区,用成功的发展实践证明区域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所谓的“夕阳产业”也同样可以获得并保持美国“硅谷”那样的国际竞争优势。

国际上,最早研究这类新的经济集聚现象的是经济地理学家及区域经济学家,他们在区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新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新马歇尔式节点(new-Marshallin nodes)、区域创新环境(regional innovation milieux)、网络化区域(networked regions)、学习型区域(learning region)(Scott, 1988, 1998; Amin and Thrift, 1994; Harrison, 1994a; Markusen, 1996; Asheim and Isakson, 2000)等与“产业集群”具有相似内涵的概念。然而,由于他们的研究仅局限于产业区位或本地化和区域集聚方面的理论研究,没有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有效的桥梁,所以一直没有引起决策者足够的重视(Martin & Stunley, 2003)。

美国的管理经济学家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对美国、英国等十个国家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进行研究时,引入了“集群”(cluster)的概念。波特的“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理念,为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战略思路,即后来的“地方产业集群”战略。他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特定领域的相互有联系的公司和机构的地理集中。他把集群定义为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以及专门化的机构和协会的现象(Porter, 2002)。在他的定义中,集群包含一系列关联产业和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其他机构;集群通常会延伸到下游的各个渠道和消费者,以及横向的配件制造商,与技能、技术和共性投入等相关产业的公司;许多集群也包括政府机构及其他机构,如大学、标准制定机关、思想库、在职培训提供者、商会等,它们提供专门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Porter, 2003)。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是产业,而产业又集中在几个有限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群。

虽然产业集群研究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不过无论是集群定义还是产业的界定都没有定论(顾强等, 2005a)。产业集群最早是在波特 1990 年出

^① 意大利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其西北部工业基础最好的地区,由都灵、米兰、热那亚等组成的“金三角”,这一地区被称为“第一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南部地区是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地区,被称为“第二意大利”;意大利的东北部与中部地区原来也是不发达的农业地区,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被称为“第三意大利”。